論　著

蔣夫人與中國的國家性質——後殖民父權文化的建構*

石之瑜**

一、前言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在近代最傳奇的接合點，就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她在中國主權締建之際，成為中國的第一夫人。作為一個女性，又深諳西洋文明，蔣夫人成為蔣介石委員長建國最得力，而又毫不具有威脅性的助手。由於中國的國家概念，既是從西方習得，則為了提振中華民族的地位，當然就得參照西方強國的經驗，而蔣夫人在觀念上引介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傳播西方的公民概念與國家思想，最為駕輕就熟，不須要刻意採納任何高深的學理。事實上，她也必須大力推展西方的國家實踐，才能使自己免於因為她的西洋教育背景，而受到國人的質疑。蔣夫人的女性身

* 本文選用「蔣夫人」而非「宋美齡」為標題，旨在凸顯對後殖民父權文化的反思，並檢討中國的主權性質，倘若以「宋美齡」為標題，則似乎賦予蔣夫人太多個性空間，與本文討論文明桎梏之旨趣不全符合。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4期（1996年8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分，使中國的建國運動對西方不具有挑戰性；她的西洋思考方式，更使西方感到自在。一方面，她的言行反映了西方國家概念中的男性至上前提；另一方面，也延續了西方國家的歷史先進地位。本文的目的，是檢討中國自辛亥建國之後所遭遇到的文明衝突，並分析蔣夫人的政治思想，說明後殖民時期的中國，如何在建國運動中，維繫了父權文化。蔣夫人的角色，不是在創建一個新的歷史，而在於她具體而微地反映了中國所處的無奈的文明位置。

二、近代中國的國家性質

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經歷過一段學習與實踐的過程。由於國家的概念在中國不同於西方，造成中、西文明接觸時雙方迥然相異的反應。對中國人的文化理想而言，國乃家的擴大，故與「天下」的範圍有重疊，中國乃居於天下之中心，中國之外無國，只有蠻夷之邦。中國盛時，近悅遠來；中國弱時，和親受爵。故中國與夷邦之間不具有相互排斥性。對西洋人而言，國是主權的具體形象，其最大的特質，就是宣告對地理疆界之內的絕對統治。由於當初國家主權的誕生，是用來對抗教會的勢力，故使西洋的國家與普世的天國之間，不僅不重疊，而且處於對立。① 同理，西洋的國與國具有互斥的特性，沒有國家主權的地方，就是落後待開發之處。

對於中國人，天子就是一種集體依附的對象，也是中國文明的主體表徵。在西洋各國來侵犯的時候，中國人最關切的是天子的尊嚴，不是疆界的完整。所以，起初中國人用的是「以夷制夷」的戰略，這個戰略的前提，乃是中國具有一個能從事判斷、進行操縱的主體，而且是居於一個較泰西各國更崇高的位置。後來，這種主體性發生動搖，社會領導人開始接受異質的文化觀點，同意以中國為主體的人類文明，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洋輸入的科技，但強調西洋物質文明必須要為中國所用。② 這時面對西

① 見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5~ 39.

② 有關科技文明之辯論，見段式文：《魔咒解除與意義重建》（杭州：杭州大學，1995）

洋人，中國抱著的是無可奈何的態度，而未必是欣然接受的心情，但中國所處的主體位置依舊可以辨識，甚至接納西洋科技（也包括若干制度）的目的，最終還是在於區隔中國與西洋。畢竟，中國的主體感覺在此已有所褪色，蓋原本此一主體性是一種直覺，乃不言可喻的，現在則必須得要有意識地作出一些區隔，才能有所維繫。

二十世紀開鑼之後，這個主體性進一步的淡化，而中國國家的出現，雖然意在挽回中國人失去的主體位置，卻似乎將此一主體感益加疏離。在民國肇建以來，知識界曾有若干人認真地要將中國文明全盤西化，以能鞏固國權。中國主權的彰顯，成為外交官的職責，因為他們必須在國際會議裡為中國折衝談判；也成為知識份子的責任，因為他們要打倒孔家店，厚植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更成為軍閥的責任，因為他們得統一中國，外抗強敵來犯。可是，中國的主權在此不僅不再是關乎中國傳統的典章制度，甚且是與文化價值及倫理規範相對立的概念。假如，中國人之所以需要主權，原先是要保護賦予中國人主體感覺的天朝，現在卻率先要打倒這個天朝制度與觀念，則人們為何還需要一個主權國家呢？

主權國家其實是中華民國的面具。清末民初很多革命志士談的，恰是民族振興之類的理想，而國權，不過是民族振興的工具而已。問題是，中國民族的主體性，千餘年來靠著天朝制度在不斷複製，即令是異族如蒙古、滿清入主中原時，都順著天朝體制而內化於漢民族的儒家規範中，一旦天朝制度崩解，則中華民族的族性要藉由什麼來體現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歸諸自己的膚色、語言與容貌。③ 這種直覺的途徑卻有其困難。首先，中華民族需要保護，恰是因為以血緣、語言為核心的民族概念不敷使用，若單純以此為民族主義的訴求內容，剛好暴露了藍眼白膚人的優勢，豈不自取其辱？其次，時值滿清遭到推翻，漢、滿所處的文明位置幾乎一致，沒有理由去強調會凸顯漢、滿差異的種族主義。④ 再其次，西方文明推崇

第二章，未出版。

③ 民初知識界與革命志士的種族主義，例見朱浤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84），頁 36～ 44。

④ 這說明了「驅逐韃虜」的口號，後來何以為「五族共和」的訴求所取代。

客觀的意識形態，致種族之類以天然為核心的主體概念，顯得充滿被動，缺乏內涵。⑤ 最後，主權國家體系既已成世界潮流，中國民族為求與泰西各國平等相持，則鞏固國權自然成為表達中國主體意識的正常方式。

中華民族是為了自救而採納了主權制度，但一旦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要藉由主權才能表現的話，主權就不再只是民族圖存的工具而已了，更是反過頭來定義民族地位，佔據民族心態的一個目的。為了讓中華民族能與世界各族平等，則所有西方國家的制度與價值，就不得不成為中華民族戮力學習效法的對象。如此一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就與民族振興失去了關聯。相反地，欲振興民族的人還必須證明自己在拋下傳統時，最能義無反顧。⑥ 文化傳統竟成為民族振興的羈絆，則原先之所以讓中華民族感到與眾不同的文化驕傲，就在近代中國崛起為主權國家之後，失去了得以傳承的舞台。傳統與現代於是對立了起來，文化與科學之間的衝突也受到誇大。至此，中國的主體性就不再能以中國人自己所習慣的文化語言來定義，而要靠西洋傳來的國家觀念來定位。⑦

西洋國家觀背後的人生哲學，可以溯自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重視人本精神，表現在國家上有兩層含意。第一，是關於國家的獨立。國家既是為了對抗教會而建構，則不得不重視物質性的生產力與軍事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財富愈來愈是國家地位優劣的主要區辨標準，一個國家向外擴張，佔領「非國家」地區的能力，更是先進文明的標竿。⑧ 重商主義在近代大興，為歐洲國家往殖民地汲取資源，卻在歐洲地區盛行保護主義的作風，提供了理論上的理由。對中國人來說，以力服人者終將敗亡。可是，

---

⑤ 種族的形成既不須要個人行使同意，則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是自然天成的，人既成為被自然決定的對象，就失去主體性，自然界也不再是與人相對的客觀現象，故而與追求控制自然的西洋科技文明不符合。

⑥ 林毓生，“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in B.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r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5.

⑦ 見周策縱：*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94–95.

⑧ 把「非國家」看成待汲取的地理資源，是主權國家存在的前提，參考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p. 2–3.

「力」（無論財力、軍力）卻是西方主權世界的理想，是主權者用來說明自己獨立自主，不受教會干預，脫離黑暗時代的證據。中國的主權要獲得平等地位，就不能不違反自己的文化天性、社會倫常與大同理想，在國際上尋求結盟，在國內征服政敵，從而疏離了中國民族與中國國家的關聯！

其次，西洋國家主權的主人，從過去的君主，發展成了公民。主權在民的理論由霍布士、盧梭等大思想家提出。主權是一個假想的契約，主權的行政被視為是一個總意志凝聚的過程。公民既是國家的主權者，則個別公民透過民主程序表達集體意志，乃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條件。⑨ 至於總意志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國家實踐中從來不是重要的事。不過，後來的大思想家認為它應該存在，而且必須存在。像康德就把國家當成一個理智的結果 (reason)，故是公民的一項集體成就；⑩ 而黑格爾則逕指國家具有一種精神作用，故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end）。⑪

既然中國要作為一個西方意義的國家，則中國人就應該要成為一個西方意義的公民。理想的公民是獨立自主的人，擁有自己私有的財產，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不用說，這種公民概念，距離當時的中國十分遙遠（即令今天都未必為中國人所欣賞），但卻成為人們（包括西洋人與受西洋文化薰陶的中國知識份子）用來評估中國國家地位的主要指標。不能獨立自主的人就是仍然無法脫離土地、依附於自然的人，因此就不能與怪力亂神徹底分開，恰亦是西洋國家要拯救的人。以農民為主的中國社會，於是給人一種權威人格的印象，即仰賴權威，不能自立的國民性格，⑫ 故係西方的理想對象。

國家的獨立主權與公民的獨立人格，被形容成是現代國家的內容。但

---

⑨ Jacob Rousseau, "Du Contract Social", in J. Rousseau, *Oeuvres Complētes, vol. III* (Paris: Gallimard, 1964), p. 361.

⑩ Immanuel Kant, *Metaphysics of Mor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3, § 44, pp. 123–124.

⑪ 黑格爾關於歷史進步與主體自由的看法，是中國文化所不熟悉的，見 Michael Cohen and Nicole Fermo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31–432。

⑫ 關於多位名漢學家所透露出他們在這方面的前提，散見於周陽山（編）：《西方漢學家看中國》（台北：正中書局，民 82）的各章。

這個特質卻又不能真正保證國家之內人人平等。尤其是這個關於獨立自主價值的推崇，免除不了社會上既有的性別歧視。質言之，社會上關於女性的社會期待，是情感的，不是理性的；是依賴的，不是獨立的；是靜態的，不是移動的；是家庭的，不是公共場合的；是生育的，不是生產的；是體弱的，不是英勇的；是自然的，不是科學的。⑬ 中國在建國時，西方用來呈現中國的種種形容詞，恰好都反映了西方世界慣於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期待，則中國的主權性質，就只能屬於與西方主權不同的另一個範疇。西方既期待中國遵循先進的西方範例，發展成一個主權國家；又因為已經居於先進地位，就傾向將中國主權女性化。⑭

故中、西文明的接觸，與國家概念在中國發生，原本大可因此而發展成中國對西方的反彈，與西洋對中國的徹底藐視。然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出現，改變了中、西之間幾乎命定的文化衝突，使得女性化的中國主權間接的能為西洋與中國所暫時接納，此為本文以下之重點。

三、蔣夫人與近代中國

關於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新書頗多，多數是描寫她個人的事跡，鮮少述及她在近代中國崛起之際，所扮演的文明銜接角色。⑮ 這個角色的背景，不是蔣夫人所能改變的；而她所處的位置，更不是她自己所能選擇的。應該說，蔣夫人的位置，符合了西方對於女性中國的期待，也符合中國人對於父權中國的期待。

由蔣夫人將西方的國家概念推銷到中國，可使得中國的主權對於西

---

⑬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例子頗多，請參考 Alison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Allenheld, 1983).

⑭ 見石之瑜：〈陰性主權：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起點〉，《問題與研究》（民 84.11），頁 25。

⑮ 張紫萬：《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 1995）；楊樹標：《宋美齡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王朝柱：《宋美齡與蔣介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1）；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方不具有威脅性。主權原本傳達的是一種排他性的宣告，任何主權的興起，本都應該對西方既有的主權國家形成威脅，但中國的主權卻沒有。理論上，中國成為主權之後，可供西方攫取的自然地域就少去了一大塊；而且，與西方競爭往文明「落後」地區佔領挖掘的對手，又多了一個。可是，蔣夫人的中介角色，大大降低了中國主權的威脅性，甚至使得主權中國看來值得同情。固然，中國國力不彰，造成中國本來就不受重視。可是在這一點上，美國與歐陸各國明顯有所不同。英、法等國看待中國時，既不在乎中國能不能成為主權，更瞧不起中國人建構主權的努力。美國有所不同，其因素自然很複雜，不過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對華的情感，受到了蔣夫人的影響。這可以說是一把雙面的劍：美國透過了對蔣夫人的期待與想像，把主權中國定位成了一個次等的、女性的主權；中國則透過了蔣夫人的西方背景，在國權飄搖的關鍵時刻，掌握了來自美國的一些援助。蔣夫人提供了中、美兩國菁英的想像空間，使得雙方根本性的立場衝突，相當程度地獲得隱藏。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中，以母親最受到稱頌。母親的工作，不是抽象地創造意識形態，蓋依既有的兩性刻板印象，咸將母親定位在生、養育之類的傳承、延續生命與複製文明的任務上，故在國家的領域內，被視為居於次等的地位。⑯ 蔣夫人將西方文明推廣於中國，同時滿足西方的兩種期待。第一，她游移於中、西文明之間，象徵了西方動態文明的先進性，她回到中國成為第一夫人，也表示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親近性。第二，蔣夫人在中國複製西方文明的努力，符合她作為一個女性的角色，而她以第一夫人的姿態，照顧中國人民，也嵌入一個母親的角色。這個母親的角色，正是使得中國人能接受她西方背景的關鍵。

換言之，主權中國本身的男性氣質，正好可以仰賴一種母性化的西方文明，來沖淡其反抗西洋帝國主義的深層動機；另一方面，中國在西化的國家建設中，也由於象徵西洋文明代表的蔣夫人所具有的母性特質，而不

---

⑯ 見 Susan Mary Okin,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8–241；另參考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8），頁 83–86。

會感到備受威脅。先進的文明經由次等性別來象徵，則其因為先進地位所散發的傲慢，就得以緩和。很明顯，蔣夫人一生都以夫為貴，她對蔣委員長介石先生的依賴，是她第二性的地位決定的，但她對介石先生在各項政策上的影響，則是以她的西方文明背景在支持。介石先生人生觀的充實，與對西方宗教的接納，深刻地受到蔣夫人的薰陶。的確，蔣委員長的地位和他奮鬥的途徑，完全落在中國父權文化的軌道上。他的裝扮與相貌就是父權象徵的極致；他對權力的敏感與嗜好，完全不可能融入社會對母性的印象；他對地位與顏面的重視，承襲著父權的風格；他對國家觀念與儒家倫理的執著，絕對不適合女性來表達。作為主權中國的代表，任何對西方的仰賴或依附，都將損及中國的尊嚴，但如果代表西洋文明的，是從屬於他的家眷，則就不存在國家尊嚴的問題了。

蔣夫人生在中、西文明的交界點上。她來自一個資本家的家庭，自幼就受洗為教徒。資本與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先鋒，其後則有洋槍大礮在撐腰。這三種文明形式表現成傳教士（ Missionary）、商人（ Merchant）與軍人（ Military），俗稱 3M。西洋文明想在中國落地生根，必須有本土的人能配合，他們無疑都出現在沿海、沿江等發達之地。本土的資本家與傳教士在中國曾受到質疑，站在中國的立場看，這些人若非買辦階級，就是人們嗤之以鼻的二毛子。不過二十世紀肇端以來，西洋文明在中國的代表卻社會地位高升，凡與西方扯上關係的人，都自覺高人一等，如外交官、知識份子。蔣夫人的家庭背景因而顯得特別高貴，再加上其長輩同情中國革命，⑰ 在變動的大局之下，其實享有免於喪失立場的心理優勢，這個立場當然是坐落在西方文明之中。

西式文化背景下的革命動機，不同於站在中國主體位置的改革，像清末立憲運動，朝廷就欠缺立場，所以扭扭捏捏，與受到日本支持的保皇黨相比，焦慮尤深。革命黨人則義無反顧，這不能不歸功於中山先生在中、西文明之間往來自如。中國人站在西洋文明的角度要求中國，其動機自然是民族主義的，但又能夠不受限於傳統中國的體制或規範已如前述，此何

⑰ 有關討論，參見司馬春秋：〈蔣夫人與宋氏家族〉，輯於陳曉林、彭懷恩、寇維勇（合編）：《蔣夫人寫真》（台北：聯豐書報，民 74）。

以蔣夫人的家庭背景，讓她以後在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時，能夠不受牽累，但當然也就因此不能完全擺脫自己成為西洋文明代理的附庸角色。

此種尷尬大約是所有後殖民的父權國家所共有，這些地方的社會菁英與政治領導，多數是受到前殖民母國的教育訓練，因此在國家獨立初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想把新國家建立在母國提供的文明範型中。⑱ 後來又會進行反思，想要超越對母國的文化依賴，重振傳統，只是發現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觀念、推理方式，都表達不出想要釋放的本土情感，因而喟嘆殖民文化所帶來的窒息效果。⑲ 中國的情形不同於一般後殖民國家之處頗多，其中之一，在於中國不曾受任何殖民國家所完全佔領，或長期佔領（台灣除外），致使中國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用語，即使白話文學的普及，也是順著中國既有的文化邏輯在推廣，並沒有成為西方文學產品的載體。所以民初的白話文文學，雖然對於傳統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也同時成為西方新觀念的媒介，但仍是本土的產物。

蔣夫人自幼就在美國接受教育，畢業於最好的大學，在大學中主修文學，也念了不少哲學的課程，這些都是傳承一個國家文化觀念最關鍵的科別。加上她對聖經的熟稔，如果當時滯留美國，完全可能就此溶入美國主流社會之中。但蔣夫人回國之後，花了不少時間學習中文，這些工夫所得的成果，可以在她的中文著作與演講中看出。蔣夫人的優勢在於她是一名女性，所以返國之後，沒有什麼強大的社會壓力，逼得她非去公共領域中貢獻所學，報效國家。簡言之，她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她本人的教育經歷，培養她成為一個文明交匯的載具；而她女性的身分，使得兩種文明都對她的另一種文明背景，易於接受。

因此，研究蔣夫人的政治思想，應該是具有啟發性的工作。一般研究政治思想的人，都將心力集中於大思想家，或著名政治人物的身上，這些人絕大多數是男性。蔣夫人的政治思想作為一項課題，或許有些不倫不類，但這種偏見其來有自：第一，顯然因為她是女性，在出發點上就不被

---

⑱ Vijay Mishra and Bob Hodge, "What is Post (-) Colonialism?" *Textual Practice* 5, 3 (1991), pp. 399-414.

⑲ Ania Loomba, "Overworlding the 'Third World'," *Oxford Literary Review* 13 (1991), pp. 190-191.

認為有自己的思想；⑳ 第二，又因為她對蔣總統的輔佐，自然就讓她的思想言語失去獨自存在的價值，而只能從政治目的上去理解；第三，還因為她的許多想法都來自於其他人，所以述而不作的性質頗高，不值得深入研究；最後，更因為沒有人曾以她的思想為研究對象，就降低了這個課題的正當性。

固然蔣夫人許多公開談話，未必完全出自於她自己的體認，而由旁人代為準備，但並不影響對她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本文關注的，是蔣夫人的言論如何建構了中國與西方文明的相對位置，同樣的話，由旁人說出，其所代表的意義，不僅不同，而且受到重視的程度也大為降低。何況，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是言論，其中正式演講只佔極小一部分，故出自蔣夫人己意者多，由他人捉刀者少。由一般關於她的傳記也看出，她對於講稿內容（甚至蔣介石與羅斯福等政要談判內容）要求嚴格，一改再改，故不致於有違反其本意的情況。無論如何，對蔣夫人言論的分析，不能脫離蔣夫人自己所處的文明位置，是這個位置賦予她的言論特殊的分析價值。

蔣夫人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國的國家本質，她關心的問題更透露出了中國人想要舒緩的集體焦慮何在。由於她個人的雙重文明背景與女性角色，她的思想言論中最能反映出時代的壓力。蔣夫人思想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本文以下將就六大議題進行簡介。這六個題目不是事先抽象認定的，而是依照蔣夫人的言論集在事後歸納的，故反映的是她的關切。這六個題目包括：國家與民族的關係、婦女在國家中的角色、適當的公民文化氣質、戰爭（抗戰）的意義、宗教與新生活運動以及對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看法。

四、蔣夫人的政治思想

㈠國家與民族的關係

在西方的國家觀念之下，民族的位置並不明顯，甚至所謂民族的範圍

⑳ 見 Jean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4.

是由國家來界定的。並不是說西方沒有民族觀念，而是關於民族的認同無法藉由主權之類的語言來表達。當國家強盛向外擴張的時候，去區分民族與國家就是多餘的事了，只有在以國家名義活動不順利的時候，才會大量引用民族的情緒。嚴格說，民族情緒應該是最深的動機來源，但如前所述，民族主義的訴求沒有科學的感覺，也沒有可以控制的客觀疆界，所以才為看似先進的國家觀所取代。若是在美國這樣的民族大熔爐，則主權國家的誕生更超越了人與人之間因為膚色、語言、文化的差異，使這個典型的移民社會，有了人們共通效忠的對象。㉑ 可以說，在美國只有國家觀念，所有關乎種族的情緒都在公共領域中受到壓抑，任何以種族為訴求的說法，都威脅到美國的立國精神。

蔣夫人留學美國十餘年，耳濡目染，當然她的國家觀念中，原不具有強烈的民族內涵。在抗戰之前，她要貢獻的對象是國家，眼睛裡看到的是世界，像她個人就是從美國到中國的。對宋美齡來說，中國與美國是平等的，故她作為中國人與美國人並不形成內在的衝突。假如她認識到中國的落後，則那是中國人自己必須肩負的責任，不過，我們看到她無時無刻不在找尋一些蛛絲馬跡，想要說明中國人其實與列強愈來愈接近，故而可宣稱，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落後的地方。她一方面鼓勵人們看重現實，蓋「如今世界已成為整個團體，誰都沒法與別國絕緣，為了要改進中國的地位，使她光榮地存在於各國之間，一定要使中國隨時代潮流的進展而進步」。㉒ 而她又舉了很多例子，來證實中國已經有了進展，如江西孩子禮貌之佳，「五年前是沒有法子發現」這種情形的；㉓ 中國農民的孩子「現在均已進了學校」，他們的住屋「已建得合乎衛生及安適」等等。㉔ 早期的宋美齡顯然是在用西方的國家標準，看待中國的落後與進步，苟不如此，她自己就成了美國之內的次等人，中國之內的文化異端。故中國作為

㉑ 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考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Liberalism," in B. Douglass, G. Mara and H. Richardson (eds.), *Liberalism and the Goo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㉒ 《蔣夫人言論集》（台北：婦女反共聯合會，民 66），頁 23。

㉓ 前引，頁 27。

㉔ 前引，頁 260。

美國標準下一個先進的平等國家，對她是一個既可望又可及的總體目標。

蔣夫人對民族意識的體認，是在抗戰之後才大幅提昇。抗戰前夕，她首先提到，「民族從前的光榮」的恢復，是「國民」的責任，但「中華民國穩固的基礎」，「還要懇求上帝扶助」，才能「創導出國家民族的新生命」。㉕ 可見，民族仍是附屬在西方國家與文明概念之下的。俟抗戰一起，她迅速地在思想上作出調整，開始宣揚以民族為主體的國家觀。最重要的訊息，似乎是把國家當成了民族振興的工具：

> 新生的中華民族，是在日新月異〔中〕締造起來，戰爭破壞不了她，在戰爭中她越發聰明，越發勤勉，越發愛國，越發勇敢。我們中國人，從上古一直到現在，不知道經過多少次天災人禍的動盪；不論怎樣長期的變亂，我們都很順利的撐過去了。悠長的數千年中，世界上的國家，有的興起來，有的滅亡了；可是我們卻能維持我們的文化，保持著我們的完整，直到今天。這一種民族的忍耐性和堅韌力，既已使我們造成了偉大的過去，當然的，牠也能保證我們今天的成功和將來的發展。㉖

雖然她相信「中國民族的特性，具有起死回生的先天氣質」，而且是「不可能征服的」，但「中國這個古字」所代表的「人格，就是無價之寶」卻在「國際局勢中……已幾經剝蝕」。㉗ 所以，蔣夫人發現民族的出路仍然是必須經由國家來找尋，因此「一切物力，一切人力，都貢獻給國家」：㉘

> 其最後目的在使一般人民充分認識做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以及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並剷除由滿清數百年的腐敗統治而產生的墮性。滿清這種腐敗的統治，使人民不問國家大事，所以就消滅了民族意識，並養成人民對國事的冷淡，而有害於國家的進步和繁榮。㉙

蔣夫人的這種想法，既賦予民族主體性，但又不承認在主權國家之

㉕ 前引，頁 767。
㉖ 前引，頁 113。
㉗ 前引，頁 247。
㉘ 前引，頁 123。
㉙ 前引，頁 190。

外，民族可能復興。故民族必須把國家當成目的，國家才能成為民族復興的手段。與早先的分析相符的是，蔣夫人恰是看到民族地位之不振，故而改採國家型態來求取平等。 1942 年，她比較完整的介紹了她的史觀，她感嘆「西洋各國對待中國，心中老是抱定了自居優越的宗旨，而且不論時境有沒有變遷，總是不肯放棄這種優越之感」，所以「西洋人侵犯了中國的主權」；㉚ 而當他們對中國的「關心與同情，仍也帶著參觀足球比賽時的情緒」。㉛ 解決之道，是「大家都須認識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長處」，因此應該要「根本改變國與國間錯誤的觀念，而促進東西民族的互相瞭解」。㉜

所以，民族的振興是在國家架構裡進行，這等於規定了中華民族要接受西洋對於富強的追求，並放棄天人合一的觀點。不過蔣夫人認為在大的西洋國家觀之下，中國人可有保留自己獨特性的空間。但這個獨特性的目的，是要使中國（作為國家）能在普遍性（即西洋）的標準下，成為與列強並駕齊驅的頭等國，換言之，是要中國人用中國的辦法，在西洋訂定的評價標準下，與西洋取得平等地位，她說：

> 我們各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也沒有相互抄襲的必要，當然它們都必須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則，但是每種民主制度也必須適合其本國特殊的國情。因此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雖然無疑的受了哲弗遜總統的機會均等與個人權利說的影響，但將不會純粹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抄襲。它將有本國的泥土味，並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智慧……戰爭的機運已使中國第一次得與列強並駕齊驅，而由於持久不屈的抗戰，我們終於贏得了這頭等國的地位。㉝

中國民族具有七大痼疾，蔣夫人指出它們是自私自利、面子、朋黨、失敗主義、不求正確、缺乏律己性、規避責任，合起來就「延緩了我們嶄露為一等世界列強的機會」。㉞ 面對腐化的官僚假愛國主義之名圖謀私

㉚ 前引，頁 249。
㉛ 前引，頁 250。
㉜ 前引，頁 250–257。
㉝ 前引，頁 266。
㉞ 前引，頁 169。

利，蔣夫人的解決之道是「建立優美的愛國情感」，㉟ 一個「民族對於他們的國家命運，必須具有充分的信心」，㊱ 而一個人「為了在民族復興的大業中⋯⋯能有所貢獻，他必須對於他的國家的光明前途，抱著絕對的信仰」，㊲ 他們必須去做一個國家應該做的事，才能成為一個國家。故「中國人民應勇於承認，在過去，中國的確未嘗盡到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義務」。㊳ 蔣夫人基於宗教信仰所提出的貢獻觀值得注意，她認為國民要對國家貢獻才成其為國民，女性要對戰爭貢獻才成其為平等的性別，國家要對國際貢獻才成其為國家。既然貢獻是取得地位的不二法門，則貢獻的對象由誰來決定，就反映出各個文明的優劣地位了。在此，不能不說她的根本出發點是矛盾的，即其中又有中國的民族主體，又有西洋的文明主體，中國民族地位的平等，是放在西洋的國家體制中來完成。

眾所周知，民族是一個母性的概念，故蔣夫人也說，「中華民族從來之偉大，既受惠於此無量數慈母之作育，中國民族將來之無窮進步，亦大賴於此等慈母之薰陶」，㊴ 但是，母親要「將其所有之子女貢獻於國⋯⋯任何犧牲在所不惜」。這種「寧視其子戰死沙場」的模範，使得「民族前途，實有無窮之希望」。㊵ 簡言之，民族必須忍受犧牲，國家才能發揚光大；中國人必須忍受犧牲，西洋文明才能發揚光大；母性氣質必須忍受犧牲，男性氣質才能發揚光大。這一類邏輯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國家被視為是振興民族的；西洋文明被視為是改造中國的；男性被視為是保護女性的。自從在蔣夫人開始討論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以來，她個人的文明背景與女性身分就凸顯出來了，這在下節更見清楚。

㈡婦女在國家中的角色

除了期待中國主權向西方標準進化之外，蔣夫人也找尋中國婦女向西方標準進化的跡象，她認識到有兩種中國女性：一種很中國，另一種已躋

㉟ 前引，頁 150。
㊱ 前引，頁 128。
㊲ 前引，頁 130。
㊳ 前引，頁 134。
㊴ 前引，頁 711。
㊵ 前引，頁 712。

身現代世界，不過她們都正從家庭的牢籠中掙脫出來，更都與浪漫主義中的印象迥異：

> 到中國來遊歷的人，他們腦海裡總特別保留著兩種不同的中國女性的圖畫，一種是剛進中國口岸時所看見的許多以船為家的婦女，她們使著勁，滿身汗，駕了一葉小舟，做我們所謂的「搖櫓」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後看見的現代女性，她們禮貌嫻雅，不僅服飾美好，還能在社交場中，應對得宜，使滿座生輝。僑居我國的外人，都有他們現實的觀念，他們目覩中國女性掙脫了古舊習慣的嚴酷羈勒，不僅從家庭的牢籠中走了出來，並且帶著她們的才幹和勇敢，進入了以前祇有男性效力的、職業與經濟的圈子。㊶

蔣夫人最早是希望動員女性來支持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原是要拯救國家免於滅亡的，而其中就「有許多工作，等待著女性的效力，保持家庭清潔，贊助社會改革等等」，因此「復興民族的工作，女性是基本方面的切實服務者」。㊷ 婦女的一切，標誌著國家進步的程度，故：

> 婦女對這個運動正可作切實的輔助。我們如果要衡量一國的進步程度，必須注意那一個國家婦女的情況，和婦女在社會生活、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數婦女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生活很合理，那個國家才是進步的國家。不幸中國的婦女，非但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大半還仍過著數百年前的陳舊生活。都市的婦女，尚有受教育的機會，但參與社會活動的仍屬少數。㊸

為了達成改革的目標，蔣夫人鼓勵「智識與才力充分的婦女，在公共事業中，能與男子負同樣的責任，他們的熱心和服務精神，同樣有旋轉國家命運的力量」。故新生活運動既要求婦女「照管家務」，又得要「為國家出力」，故要才智較高的人，「去指導她們的鄰舍，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家務；應當教她們四周的婦女識字讀書」。㊹ 俟抗戰爆發之後，婦

㊶ 前引，頁 94。
㊷ 前引，頁 43。
㊸ 前引，頁 45。
㊹ 前引，頁 46。

女們的公共生活領域，更無限擴大：

> 為贏得戰爭的勝利和我國的復興，婦女們所必須擔任的建設性工作，愈來愈為重要。現在許多人都在說，為實現這一偉大國家的任務，有一半責任應該放在婦女身上，因為她們構成人口的一半。如果從這種議論引申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那麼婦女是否也應該享受一半權利和一半榮譽呢？可是，她們並沒有想到這些事情。她們所想到的是支持抗戰，充分認識爭取國家的勝利應該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責任。雖然，這些並無礙於男人想起婦女的本分究竟是什麼。儘管她們只是在最近纔確定了她們自己的地位，並證明她們的價值並不僅限於家庭範圍以內的事務，但她們是人，是公民，也是婦女。㊺

所以，蔣夫人並未要求婦女完全走出家庭，而是要「打破使她們長期不能參預公共事務的障碍」，其目的同時是家庭與國家，讓「忠貞、容忍和正義的空氣……永遠瀰漫於國家的大廈和家庭的門限之中」。至於她本人，「祇要就丈夫的需要，儘力幫助他，就是為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當然，她也知道這是因為她個人的「機會很好」，「與丈夫合作」就同時照顧到國與家。㊻ 不過，就整體而言，蔣夫人覺得多數中國婦女「已懂得運用其天賦及由環境養成的柔順及平易之性格，使其才能足以適應常變的社會條件」，㊼ 此何以抗戰一起，婦女團體在各地如雨後春筍似的出現。既然仍身在家庭，則婦女想要爭取平等的地位，就必須和男子一樣地貢獻於戰爭，以證明女性的價值：

> 我確信我們中國女子在戰時的貢獻，至少要不下於男子；我更確信我們中國女子，在抗戰勝利的地位，比之世界任何國家的女子，一定是後來居上；我相信男女地位應當是絕對平等的，但我認為這不是向人去要求的問題……我們要在抗戰中間盡我們女同胞的責任，

㊺ 前引，頁 177。

㊻ 前引，頁5。

㊼ 前引，頁 206。

那麼在戰爭勝利以後，新中國的女子地位，不提高也要提高。㊽

問題是，這種在國家領域裡的付出，會不會與婦女的家庭責任有所衝突呢？在觀念上，為了做一個國家公民，所要求的正是先放棄自己的婦女氣質。蔣夫人在回憶西安事件時，就透露出了這種心情。在蔣委員長遇劫的消息傳到時，她說，「第一念襲我心頭，余為婦人，世人必以為婦人當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的探討，故余必力抑個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㊾ 她面對虎視眈眈的國民黨各派領袖，強調她不是一個妻子，而是一個公民：

願諸公深信我決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之婦人。今日此舉，實抑制情緒，抓緊現實，乃以公民之資格，要求以最少之犧牲，為國家與民眾解決此嚴重問題之癥結。倘余夫或余個人之犧牲可以為國家造絲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犧牲。㊿

好像作一個公民的意義，就在於壓抑婦人的情感，但相對地，婦女的氣質仍可以間接地貢獻於國家。故蔣夫人發現，婦女在成婚之後，多「無所用心」，現在則應「強迫」她們「承擔起應盡的國民責任」，一旦婦女擔任起男性工作時，只要具有國家意識，就可以有聲有色，「能夠忍受戰場上的艱苦；能夠忍受戰爭驚天動地的怒吼」；㊿¹ 當她們不從事戰場或國家工作時，則因為具有「兩種品質，那就是母愛和溫柔」，故能夠擔起戰時後方的責任，並可以「鼓勵男子，使他們知道我們有我們的方法來輔助他們，使他無後顧之憂，並且我們也準備犧牲一切……」。㊿² 可見，無論是壓抑，或貢獻，婦女在國家面前必須先做到為國效忠，才能求婦女解放：

我們今天來談女子解放，也要曉得國家沒有解放，我們全國的女子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我們國家今天受敵人這樣的欺侮侵略，整個民族處在暴力重壓之下，全國同胞流離痛苦，我們不先把這個危急的國家扶救起來，我們四億五千萬人無分男女，都要做亡國的奴

㊽ 前引，頁 731。

㊾ 前引，頁 55。

㊿ 前引，頁 59。

(51) 前引，頁 175。

(52) 前引，頁 691。

隸，更從何處談女子的解放，更向何人去要求女子的解放。[53]

蔣夫人提醒所有的女同胞，「我們是屬於民族的，不是民眾屬於我們的」，在這一點上，男女是沒有分別的，故「國家戰爭之能繼續維持，與婦女精神力量能支持與持久的程度，有極密切的關係」，[54] 她認為婦女即使無法直接有助於戰事，但卻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 雖然婦女由於生理體力與社會分工等關係，很少直接參加軍隊工作，但他們對戰爭的勝負，實有很大的影響。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足以說明良將常出于賢母的啟導，士兵的戰鬥力多賴健全的家庭組織來維持。[55]

同樣的道理，女子多數都能做的，還有「務農」[56] 和：

> 安慰出征軍人家屬，和協助出征軍人家屬，我們要經常慰問前線將士和陣亡將士的家族，使他們精神上得到安慰。我們還要扶助他們能夠自立，譬如舉辦小工業，組織手工業，傳授農業生產技術，幫助組織合作社等等，使他們經濟和生活不發生困難。並且幫助他們解決子女教育問題，這樣出征軍人們沒有後顧之憂，一般同胞們，就可以踴躍應徵上前線。[57]

在理論上，這種以男性戰爭為主的貢獻觀，對於婦女地位提昇的效果是雙重的。其正面的效果，是說明了母親關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先生或孩子，還有民族的下一代，故將女性的角色與國家的前途作了結合，在這一點上，女子無遜於男子，此何以蔣夫人相信，中國女子「在抗戰勝利後的地位，比之世界任何國家的女子，一定是後來居上」。[58] 但是也存在負面的訊息，即婦女們仍得負責照料自己家庭中的先生與子女，偏偏以自己家庭為主的活動，又被說成是與國家戰爭的需要相悖的。故儘管婦女們可以走出家庭，照顧別人的子女，但人們之所以委託她們照顧民族的下一代，

---

[53] 前引，頁 714。
[54] 前引，頁 736。
[55] 前引，頁 731。
[56] 前引，頁 740。
[57] 前引，頁 716。
[58] 前引，頁 731。

正是因為她們原本都是在照料自己的子女，這個照料自己子女的責任，現在既是婦女們國家角色的依據，又是她們受人擔心會出現自私行為的原因！尤有甚者，婦女們擔任的生、養育工作，勿須國家給以培訓，故恐怕不完全會受國家意識所左右，蓋婦女角色並不是為了服務國家而發生的，而是在國家制度出現之前早就存在的。⑲ 相對於此，男子的國家角色都須要培訓，而且是為了國家體制的運作而受培訓。因此，抗戰雖然證明婦女對國家一樣可以有貢獻，其根本地位卻未必一定上升。

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同時也在從事西化的國家建設運動，而這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衝突。解決之道，是把中國的婦女帶進男性化的建國運動之中。國家既為男性的領域，則以國家建設、新生活運動與抗戰為核心的婦女運動，就不會對男性造成威脅，何況包括蔣夫人在內的這些婦女，仍得在家庭中扮演著附屬的角色。其結果，後殖民中國的建國運動，唯獨不需要男性在社會角色上作出重大調整，他們都在國際領域中受到女性化待遇的現象，沒有改變國內的父權結構，在這一點上，後殖民中國與父權中國是同一戰線的。

㈢公民氣質

如前曾述及，西化的國家是以公民所組成，中國如果要與列強平起平坐，就也要將自己的人民培養成公民。新國家的公民與天子腳下的臣民，兩者氣質迥然不同。臣民組成的社會叫民間社會，對於朝廷的態度是敬而遠之；公民組成的社會叫市民社會，對於政府的決策抱著參與的心態。⑳ 苟欲成為現代國家，中國人必須在生活上從土地與自然中解放，在政治上從朝廷與仕紳的權威中解放，在經濟上從農奴的身分中解放，在心理上從集體主義意識中解放。可是，這些解放都是有文明前提的，如果不先檢討公民文化的文明假設，則無異是協助西方國家延續沒有殖民主義的文化侵略。然而，由於清廷的積弱不振，使得革命志士失去了檢討的耐性與動機。處於文明交匯的人，更是習以為常地將西方的公民文化當成理所

---

⑲ 關於國家介入生、養育的研究，可參見 Mary O'Bria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1).

⑳ 關於這方面的全面討論，輯於張福建、蘇文流（合編）：《民主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 84）。

當然的範例。

西方國家遍採代議民主制，則現代的中國公民也應該具備代議制的參與水準，即蔣夫人眼中「在現時代的民主政治下能夠成為有用的公民」。[61] 這要求從小培養兒童「能自愛自立」，並且摒絕他們的「依賴性」。[62] 蔣夫人為了完善民主體制，也鼓勵中國人能自己組織起來，但她認識到老百姓其實尚未成熟到可以負責：

> 要他們起來建立新國家，既沒有智識，又沒有經驗。他們多數是目不識丁，官治推翻以後，有的人竟以放縱恣肆來作為自由兩字的解釋。政治與公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從前聽都沒有聽見過，因此就像非笑一件稀奇東西那樣，加以非笑起來。從前官僚所負的責任，現在忽然轉移到民眾的肩頭，他們惶恐無措。革命領袖……勸導他們組織團體從事各種有益的活動，這在先進國家原是公民應有的責任，而他們卻認為多事……。[63]

蔣夫人擔心中國人保留過去習性，事事委諸天命，因此而欠缺公共責任，以自掃門前雪為滿足，無法「養成西方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識」。[64] 其結果，「一切西洋的理想……原很容易介紹進來，但中國因為有那種反動力量存在，就處處受到阻礙」。[65] 不過，也不是沒有值得欣喜的現象，像「輿論的力量，顯然可以影響國事動向了」，蔣夫人指出這是「清朝崩潰而後，中國最重要的進步」。[66] 她仍批評辛亥革命以來當政的人，並不瞭解現代國家的真諦，所以好幾年「可說是完全虛度」，濫用了共和政體，因為在心態上，「他們大都以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僕」。[67] 在政府能夠自覺之前，要期待人民形成輿論，蔚為公意，殊不可能。國民政府計劃實施憲政，旨在改變人民「認為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

---

[61] 《蔣夫人言論集》，前引，頁 701。
[62] 前引，頁 721。
[63] 前引，頁 21。
[64] 前引，頁 25。
[65] 前引，頁 34。
[66] 前引，頁 35。
[67] 前引，頁 37。

的印象，使他們進而「對公共生活、國家大業」發生關切，而不只「孜孜兀兀，保護一己或一家私利」。㊳

這是為什麼蔣夫人引用華盛頓的話，警告政府重視輿論，而為了「使人民的呼聲凝結在一起，並使其發揮效能起見，須特別注意它的適當的運用，以利用團體政治」。㊴ 如此，公職者不會忘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蓋「人民既繳納租稅，他們理應得到良好忠誠的政府」。㊵ 一旦人們「認識他們的公民責任，瞭解國家的問題所在，和獲得運用投票權的能力」，㊶ 就可以替立憲政府，「贏得全民澈底的效忠」。㊷

蔣夫人心中的理想公民，與西方大哲學家的願望類似，即希望公民能有獨立自主、積極進取的能力，可是最後又都能形成公意，而享有共通的效忠對象。一方面，個別公民要自發的參政，認識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又應該知所自制，以社會福利為重。這種個體與集體利益合致的迷思，正是西洋民主政治迷思所在，也因此彼之國家理論，特別強調是代表總意志。中國的人民原本熟悉集體主義的文化環境，只不過這個集體不是由人民個別表達意見後出現的，而是事先由天子來象徵。一旦西方的國家運動來到中國，要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前提拿掉，然後告訴人們在發揮自由意志之後，就會形成集體的總意志，則中國人不啻是必須作一百八十度的思考大轉變，蓋以前集體主義是起點，現在變成終點，如果轉得不成功，則中國自然顯得十分落後。

蔣夫人的公民理想，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看來固然耳熟能詳，但並不代表已然溶入中國文化。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建國之初就定下的西洋公民典型，至今是決定文明優劣的標準，此何以中國的國家發展始終看來不成熟。由第一夫人宣揚的公民理想，沒有暴戾之氣，更無高傲之息，說服性頗高，對於已經向自己傳統革命的中國人而言，來自第一夫人對國家文化的反省與期許，自然極具吸引力，致使此一公民範例所隱含的文明軌跡，

㊳ 前引，頁 38。
㊴ 前引，頁 149。
㊵ 前引，頁 145。
㊶ 前引，頁 157。
㊷ 前引，頁 156。

反而就不再受人注意。中國人之所以搞革命原係要抵抗西洋的侵略，現在既已接納了西洋的公民理念，則革命也就退出歷史舞台了。

(四)抗戰的意義

戰爭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重要條件，蓋主權是以排外作為主要內容，則若沒有潛在的外敵作為被排斥的對象，排外的訴求便失去意義，那麼主權之內與主權之外的區別也失去依附，⑦③ 豈不又會回到黑暗時代那種混沌狀態，使人無法假藉國家名義來控制一塊客觀的地理疆界？如此一來，人失去對自然的控制，科學的世界又將消失。明乎此，就知道沒有戰爭便沒有國家，此何以西方世界創造了權力均衡的概念，因為在均權體系裡，所有外國都是潛在敵人，從而鞏固了國家制度。故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雖然吾人表面看到的是有了國家，才有戰爭，才有權力均衡的遊戲；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裡，是權力均衡的感覺與戰爭行為在維繫國家。

戰爭必定有死亡。西方心理學家從死亡心理學裡分析戰爭對西方國家的意義，認為戰爭是一種宗教上的犧牲行為，透過終結生命，來解放形體加諸於人的限制，使人的精神能超越形骸，與國家的精神結合。⑦④ 國家的存在，是假助於這一類的犧牲來成就的。由於國家原本是抽象概念，透過戰爭而具體化，據說這種抽象生命與道德昇華是屬於男性的，因為女性透過生、養育活動（不需要靠著犧牲性命）來認識生命，而戰爭威脅生命，故對女性的認同是一種否定。⑦⑤ 加上戰爭仰賴的士兵來源，都是男性，故以戰爭或潛在戰爭為前提的西方國家，必須是男性為中心的。⑦⑥ 任何後殖民國家的成長，如果也能透過戰爭洗禮，則其成為主流國家的表面機會也將大增。蔣夫人對這一點有深刻地認識。

---

⑦③ 見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Minneapoils: University of Minnisota Press, 1992), p. 33。

⑦④ Steven Kull, “War and the Attraction to Destruction,” in Betty Glad (e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War* (London: Sage, 1990), p. 46.

⑦⑤ 見 Nancy Hartsock, “Masculinity, Heroism and the Making of War,” in A. Harris and Y. King (eds.), *Rocking the Ship of State*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33-152.

⑦⑥ 關於這一點的深刻思辯，參見Betty Reardon, *Sexism and the War Syste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5).

蔣夫人認識到，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一種犧牲的極致，也是讓中國真正茁壯的契機。為抗戰所作出的犧牲，將使得原本不相屬的民國之國民，在精神上相通。每一個人所作的犧牲，都使自己和抽象的國家結為一體，也就和其它作出犧牲的國民，共同分享了國家的榮耀，他們都超越了小我的形體，與不朽的國魂共存，因而在道德上獲得新生、重生、永生：

> 我們的責任也一天加重一天，而我們的力量和愛國心的測驗也一天嚴重一天。我們不負這種委託，不獨需要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勇氣，並且也需要明澈的覺悟，斷然放棄一切自私自利的觀念。目前最要緊的是，最高度的斷然合作，準備盡我們的力量，從事一切福國利民的事業。這時期絕對不能容許有個人名利的觀念，更不容許發生私人間的磨擦和懷疑。我們要貢獻我們一切的所有，來完成唯一的目標，我們應有統一的信心，這目標就是救國。這一次國難，或陷我們於萬劫不復的絕境，或使我們獲得意外的福利……日本把我們全國化為灰燼，化為瓦礫場，我們就在這灰燼，在這瓦礫中，建造起一個偉大嶄新永遠統一團結的民族。⑦

這一類因戰火肆虐反而獲得新生的感覺，是蔣夫人手著《我將再起》的深層訊息，因為戰火而帶來的希望，在每一頁的字裡行間悸動人心，如「中國即將像寓言中的神鳥，從焚燒它的火焰餘燼中出現」；⑱ 在「焚毀的家園的灰燼中，從我們的山嶺的顛峯之上……同聲高呼，我將再起」；⑲「中國的民族特質，具有起死回生的氣質，所以中國的精神，是不可能征服的」；⑳ 七七盧溝橋事變這一天「是一個光明新時代的開始，是晨曦的初生」。㉑ 死亡與生命成了同義字，死亡的是人民的肉體，新生的則是他們精神凝聚而成的不朽國魂，故中華民族為了抗日武裝起來，「目的要使中國以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生於天地之間」。㉒ 中山先生創建民國逾四

---

⑦ 《蔣夫人言論集》，頁 117。

⑱ 前引，頁 145。

⑲ 前引，頁 174。

⑳ 前引，頁 247。

㉑ 前引，頁 725。

㉒ 前引，頁 725。

分之一世紀不能建立獨立國權，竟因抗日一役而遂其功，蓋抗戰提供了犧牲，而犧牲則證實了中國的誕生：

> 我們的士兵走上戰場，就準備以生命報國，他們覺得負著神聖的使命。他們決心以最大的犧牲，來完成這種任務，而且他們的家屬也有同樣的愛國心。我見過很多抗戰烈士的眷屬，我絕對沒有聽見他們有一聲怨恨之詞。悲哀當然是免不了的，她們覺得以她們的一切〔貢〕獻了國家，實有無比的光榮，絲毫沒有遺憾。[83]

新生的感覺在蔣夫人提出的一個比喻中達到極致，因為她將國民政府撤退大後方的無奈，描寫成了一種拓荒精神。她以美國為例，拓荒先鋒深入西部處女地追求土地和黃金；而中國西部人煙雖稠，但由於「關山阻隔，山徑崎嶇」、「缺乏熟練的勞工」，故也是「無法開發他們的天然資源」。[84] 抗戰使中國西部獲得了大量的工匠，加上空運與汽車公路的開發，使得中國人能和歷史上每次天災人禍時一樣，有了「恢復元氣的力量」，使「我國人民將繼續奮鬥，並將繼續生存、興盛和繁殖」。對於久居美國的蔣夫人來說，「西部」是充滿傳奇與原始力量的泉源，使她相信，在中國的西部，也將會創造出「一個新中國——一個在戰火中鍛鍊成的國家，顯示著智慧、進步、不屈不撓，和大無畏的精神」。[85] 和美國西部拓荒史上不少人因此犧牲一樣，中國的拓荒則在軍民先烈的犧牲中進行：

> 我們所經歷的艱難和困苦，真無異於一首悲壯的史詩……我們的生命財產受著多大的犧牲，償付著多大的代價……然而這又算得什麼，今天或明天，我或你，都有機會在殺人的敵軍殘暴行為下作壯烈的犧牲，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前線幾十萬戰士先烈，我們全國幾百萬無辜同胞，早已用生命來作為爭取國家生存的代價了……每一個同胞的生存，無不是已死軍民先烈犧牲所賜予，所以我們應當為中國而生，也應當為中國而死……要從勝利中產生一個新的中華

---

[83] 前引，頁 253。

[84] 前引，頁 138。

[85] 前引，頁 139。

民國。[86]

雖然這種犧牲建國是西方男性中心的國家觀，但中國抗戰的幅員與慘烈程度，必然也動員到了女性，使許多「非戰鬥的婦孺，被炸得血肉橫飛，死傷枕藉」，因而迫使生於抗戰中的中國婦女，「立刻覺悟了自己的責任，認識了在國難期間應盡的義務」。[87] 原本安居於室的婦女，「所感受到的死傷危險，與前線並無分別」，於是婦女與男性士兵因為抗戰而有了精神上的交通，而且這些彼此不相識的婦女，從各個行業聚在一起，「任何年齡、任何地位的婦女」，不論是誰，在戰爭中「都專心壹志救死扶傷，慰勞軍隊」。[88] 蔣夫人列舉了各階層的婦女從事各種捐輸與奉獻，她們「忙於編織絨衫，翻製棉衣，縫製短衫褲，以及綳帶被單」，另外有人從酒樓、舞廳出來到醫院或救濟機關，甚至還「駕駛著開赴戰場的汽車或運輸車輛」。[89] 原本婦女被視為是不問公共事務，自利自私的特性；卻因抗戰而共同為一個抽象的國家生存而奮鬥，為她們成為新中國的公民打下基礎，這不能不說是抗戰對中國國家建設的效果。

婦女參加抗戰工作也提昇中國的國家地位。原本婦女是象徵被動的人，而中國也始終為西方國家看成是被動的女性國家。婦女的戰爭活動改變了女性被動的印象，也等於改變了中國那種被動的國家形象。蔣夫人就認為：抗戰改變了西洋人眼中的那種美術與中國的印象。[90] 男男女女全部動員，而且在戰場上絕不投降的表現，使外國人驚異，因為他們寧願殺身成仁，而不肯污辱其國體，其原因之一，是中國的男人身旁有果敢的女人，日本最愚蠢的，即「忽視了中國婦女堅強的抵抗力，而自食惡果」。[91]

蔣夫人對抗戰的描述，十分符合西方國家觀當中的戰爭前提。抗戰也被視為是一種犧牲，但死亡的訊息其實是「重生」，在中國，也可以說是「覺醒」。國家的重生，象徵著舉國一致的效忠，則男尊女卑的社會現象

---

[86] 前引，頁 726–727。
[87] 前引，頁 95。
[88] 前引，頁 97。
[89] 前引，頁 98。
[90] 前引，頁 253。
[91] 前引，頁 208。

就隱晦不明，在國家之前，沒有人能計較自己，或個別團體的權利是否平等，在此，主導的邏輯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中國的國家是在戰爭中建成，則爾後遭逢挫折，必然也會與西方國家一樣，走上靠著排外對抗來凸顯主權的路子。

㈤宗教與新生活運動

蔣委員長發起新生活運動，原本是要恢復中國的固有道德，重新提振民族精神，也就是「以禮義廉恥四維為基礎」，來「糾正人民萎靡苟且的習尚」，[92] 但由於蔣夫人自己的宗教背景，故又賦予了新生活運動新的意義。西洋宗教力量來華時間最早，蔣夫人認為那是唯一值得稱道的西洋影響，蓋「除了基督教會傳道以外，處處表現得他們意欲儘可能地用暴力來掠奪我們」。[93] 她對西洋教會的好感，使她興起了用教會來推廣新生活運動的念頭。這種想法頗受委員長支持，委員長個人的宗教觀，深受宋美齡的母親所影響，在宋母去世後，蔣夫人就擔起「鼓勵委員長精神生活的任務」，她也自覺因而「日漸和上帝接近了」。[94]

西洋宗教觀具有強烈的外延性，與中國宗教的靜思悟道有所不同，蔣夫人曾比較上帝的意志與參禪兩者，她認為參禪就像望梅止渴，「祇能使精神一時興奮」，可是卻不能持久，而她自己絕不以此自足，而「一定要探索生命的泉源」。[95] 這裡凸顯了中、西宗教在歷史背景上的差異。基督教會是主權國家興起之後的產物，其與黑暗時代教會壟斷的實踐迥然不同，教徒無須透過主教，就可直接與神溝通，頗符合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本精神，也支持近世盛行的物質文明：

> 有人稱基督教是物質文明的代表，這論斷是確切的。各種科學文明，使近代生活舒適幸福，一切節省時間的設備，間接延長人類生命，而基督教國家乃是各種科學發明的策源地。原始的自然科學，古希臘已有相當的貢獻，然而發揚光大而成為人類的共同享受，實

---

[92] 前引，頁 21。
[93] 前引，頁 249。
[94] 前引，頁 5。
[95] 前引，頁 7。

> 在是基督教國家獨有的功績。我們把這些近代生活的方法很迅速地介紹到中國，而人民也毫不懷疑地接受它們。[96]

蔣夫人的宗教信仰，要求她必須找到新生活運動與基督教義之接合，這可以分為兩方面來理解：一個是關於教會在實際上加入新生活運動，另一個則是基督教可以從宗旨上來將新生活運動定位。關於第一方面，倘若教徒不能支持新生活運動，將之視為舊道德，則將使第一夫人面臨心理上的調適困難。所以新生活運動伊始，她就要求動員教會，這固然有助於運動的推廣，也不能不說是藉教會來確保運動不會向有違基督教文明的方向走。蔣夫人將教會的介入，看成「重大的成就」。[97] 她擔心教會不支持，所以經常又告訴教友，加入新生活運動可以改變中國老百姓對教會的批評，此所以各地教會的「響應是足以驚人的」。[98] 當夫人隨委員長第一次為新生活運動巡歷中國各地時，看到內陸窮鄉呈現出她不熟悉的中國，這多少促使她每到一地，都要召集教友援助新生活運動，她對教友的熟悉，遠超過她對新生活運動的對象的瞭解程度。事實上，她認為教會所培養的人才，正是新生活運動的媒介：

> 新生活運動就跟中外的教會團體、公立和私立的文化機關積極合作。這些文化機關，已有很久歲月，把西方的文學、科學和技術，沉靜地、有效地教導和訓練我們許多民眾。他們表現了真正基督教的精神，造成了許多能力充分和道德高尚的公民。然而這些有用人才，被軍閥和腐化官僚們擯棄了，或者給他們以非常卑微的職位，用如不用，於是他們也就無法得到參與改革國家的機會。但到新生活運動創導以後，這些久已準備及等待了好久的人才，就被徵請了來，給以負責的地位。現在，他們在改善國家的工作中，正各自貢獻著不凡的努力。[99]

除了在人事、組織上，結合教會之外，蔣夫人也力圖說明在宗旨與觀

---

[96] 前引，頁 683。
[97] 前引，頁 204。
[98] 前引，頁 706。
[99] 前引，頁 619。

點上，新生活運動與基督教之間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不僅對蔣夫人很重要，對教會很重要，也對西方文明是否能接納中國舊道德一事，更具有啟示性。以蔣夫人所處的文明交匯位置，和其第一夫人的角色，這個共通性的建構，關係到她人格的完整性，故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原本新生活運動是要改造人們的生活態度，但蔣夫人為它添上了信仰的因素，而且不僅是人民的信仰問題，更是領導者的信仰問題，她相信在這一點上，中山先生作為一個「信仰和行動完全具備的偉人」，在靈魂上「和我主耶穌殊途同歸」。如斯為信仰而死的熱情，看出中山先生與主耶穌所求，都是「復興人民的精神生活」：[100]

> 基督生活的起點，實即「在精神上作激劇永久的改變」，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新生」。「改變人生觀，改變習慣與生活型態」，這是新生活的內容，也就是復興國家的適當起點。所以廣義言之，在復興國家的過程中，這一部分的建設，乃是教會所應盡的義務。既是這樣，新生活運動與教會就得一同負起這個責任來。[101]

新生活運動與教會所共同要動員的對象之一，是婦女。蔣夫人看到「凡是基督教義所流傳到的地方，婦女地位也一定會隨之提高」。[102] 這些婦女的主動性提高，分散到各省參與並領導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的四維美德，不一定能增加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活動力，但透過教會的組織，不僅婦女成為推動固有道德的傳播媒介，而且還能藉著新生活運動的社會網路，從事具體的社會服務。蔣夫人除了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教會帶動的女青年如何協助推廣新生活，而且贊揚女教士在抗戰期間，留在戰區幫忙同胞，在日本威脅下，「固守著他們的立場」。[103]

教會與新生活運動的結合，不僅提高了運動的積極性，最重要的，是使彰顯民族舊道德的主張，有了一個可以與新時代、新國家溝通的語言。有趣的是，新生活運動是對民國建立以來的社會亂象所提之對策，這些亂

---

[100] 前引，頁688–689。
[101] 前引，頁 689。
[102] 前引，頁 689。
[103] 前引，頁 705。

象之所以被當成亂象，及其之所以發生，恰是由於新國家所孕育的全盤西化潮流所致，故是傳統文化對西化的一次反彈。可是由於與教會的活動結合，則其反彈的意義反而獲得淡化。而且，新生活運動所鼓吹的禮義廉恥，其前提是集體主義。但基督教文明散佈的，則是個人主義。像這一類中、西文明的矛盾統一，既幫助在西洋文明下的人去詮釋中國舊道德，也有助於中國人去接受西洋教會。這對蔣夫人而言，當是最自在的結局。

而對於西方文明來說，新生活運動與教會的合作，提供了西方一個更寬廣的想像空間。如果，新生活運動能造就出西方能理解的、期待的、西化的中國人，則西方的歷史先進位置，就能得到進一步的確認。照道理，新生活運動是一種民族自救的運動，運動的推行者和運動的對象並不是能明白區分的不同主體，他之間沒有文化位置上的優劣之分，而且運動所散佈的，是關於生活的態度。可是西方的教會，卻將新生活運動看成是一項救世活動，所以推動新生活運動的人，是已經看到象徵真理的歷史先進者。蔣夫人在一篇發表於美國的文章中，特別引述了江西教會給她的一封信。江西教會是新生活運動的重鎮，其觀點值得引述，以揭示教會如何詮釋新生活運動：

> 剿匪和新運工作，兩者都是掃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類敗德的開創工作。新生活運動，和耶穌基督的計劃差不多，也是救援貧苦者、被壓迫者、疾病者以及無享受生活機會的兒童而設施的。中國將由此而統一富強，得到世界的尊重；而這個新中國，一定像她光榮的昔日那樣，以四大美德為立國的基礎，同時還吸收了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成分。[104]

不論是蔣夫人給予江西教會的啟示，或是它自己悟出的道理，他們都是站在西方文明的位置上來期許中國。中國的主體性在此是被動的，中國人要如何回頭看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並取得一種信心十足的聯繫，反而是西方不必關心的事，則此一主體性的國家地位，恐怕也是不完全的。

㈥資本主義

雖然蔣夫人關於資本主義的描述不多，而且十分散漫，但要了解西方

---

[104] 前引，頁32。

的國家本質時，仍不能不提及資本主義的要素。人們不討論資本主義，並非它不重要，反而是因為它的影響力無所不在，近代西方國家對之習以為常，其已深入生活之中所致。不用說，西方國家來華的根本動機之一，就是關乎資本主義的。基督教文明所鼓動的進取精神，是資本主義的深層條件；洋槍大礮的背後，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在支持；而他們所要援助的西方在華商人，就是資本主義的先鋒；他們的前進基地，更皆是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擴張下所攫取的亞洲殖民地。

蔣夫人生長在中國最早期的資本家庭，年幼時又在美國的資本主義文化中耳濡目染，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超過一般國人，對其接受程度也較高。但在中國大陸這個缺乏資本主義環境的情況下，加上自中山先生以降，國民黨領導階層俱能將社會主義朗朗上口，她自然不能不有意識地在觀念上或政策上，作出一些調和的主張。更重要的，她也必須取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信任，西方資本主義能在中國發展，同時有助於中國「進化」成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也有助於蔣夫人自己能站好一個接合中、西的位置。

她首先批評中國過去對資本主義的排斥，害得「我們由農業階段出頭的日子，遲延了若干代之久」，[105] 也使「中國與近代科學工業的進步不發生關係，而與一日千里瞬息萬變的世界脫了節」。[106] 蔣夫人認為今後中國必須在各方面進行配合，她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表示，中國「將使私人資本得到它合法的地位，因私人資本可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她認識到這需要「良好、公正與完善的法律及法規」作礎石，才能使「我國天然資源得以自由與安全的開發；現代化工業得以建立」。[107] 中國在戰後至少要「一百年後方能和任何國家競爭」，而這期間需各種外國產品，「尤其是機械、工具以及各種各樣的工業品」，另外，來自「外國的投資，也永遠歡迎的」；相反地，如果任由日本佔領中國，它「將以廉價的貨物傾銷到

[105] 前引，頁 162。
[106] 前引，頁 248。
[107] 前引，頁 166。

全世界」，⑩ 而日本自己「任何東西都無須向別國購買」。中國則已經面向資本主義，絕不會走回頭路了：

> 不論遭到那一種意外，我們決定按著現代的路線，採取適應我們環境和需要的方法，利用外國資本，開發我們的資源……就常識而論，我相信一種沉著切實地開發經濟資源的計劃，加以交通的擴展，和保障貿易的法則，會把以前的困難完全去掉，使人人有進行他業務的興趣，決不像從前那樣……若使世界的糾紛，根本為了原料缺乏，那麼讓我們來開一個方便之門，在互利的基礎上，允許各國購買我們所能供給的原料，大家有均等機會，並不讓任何一國占到特殊的優惠。⑩

不過，由於中山先生的思想有重要部分是來自社會主義，故蔣夫人就必須要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由於這兩種主義是對立的，尤其社會主義的提出正是針對著資本主義的弊病，故她必須緩和中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威脅。蔣夫人先表示她「反對為了沒有天良的資本家的利益而流著工人的血汗」；⑩ 而且中國的同業工會歷史悠久，可以為政府分擔工作；⑪ 此外，中國自己的商人，也應該保護他們有「一個活動的範圍」；⑫ 但所有這些事都是在追求個人的尊嚴與權利，蔣夫人如此緩和社會主義的威脅性：

> 中國的社會主義，如果你願意這樣稱它，其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在保持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唯有一般國民都感到滿足，然後國家才能富強。可是要他們感到滿足就得保障他們個人的尊嚴和權利。我們所追求的是珍重人格的價值，因此我們正在給予個人以日益增進的權〔利〕，俾能解決其本身及整個國家的前途。⑬

在上述的表達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消弭了。社會主義在

---

⑩ 前引，頁 607。
⑩ 前引，頁 609。
⑩ 前引，頁 612。
⑪ 前引，頁 264。
⑫ 前引，頁 608。
⑬ 前引，頁 264–265。

中國的傳播多少是以集體主義文化為其背景，但經過蔣夫人的詮釋，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成了個人哲學的發揚。這樣一來，中國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國家發展計劃，就不會引起西方的疑慮。犬儒的人可能會指出，蔣夫人的立場，受到她自己的階級背景所影響，故不能以中、西文明相互定位的角度來理解她的看法。吾人不能否認蔣夫人自己的成長環境必有其作用，但此地重點在於她並不是資本主義中的領導群，事實上，她身為女性，是附屬於那個資本階級的，因此她的觀點所反映的，不是她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是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所淵源的西方文明觀點，也是何以她用資本主義來期許中國，其最根本的意義，在於當時中國的國家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產物。

五、結論

蔣夫人的政治思想受到她自己的生活經驗所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兩部分，就是她在美國所受的教育和她家庭的宗教與社會背景。她回國之後參與國家建設，足跡遍及內陸各省，甚至在國家體制中擔任領導職務，其中較受人重視者包括航空委員會、工業合作社、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戰時兒童保育會、傷兵之友協會、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等。最後，她第一夫人的身分，也使得她對於中國問題與一般知識份子、資本家持有不同看法。蔣夫人將西方關於國家的一些期待，透過演講、文章與媒體報導，傳達給國人。

質言之，蔣夫人對於國家、公民、戰爭的看法，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西方的價值，所追求的是獨立自主之類的目標。她領導婦女運動，要求婦女要像男子一樣，貢獻於國家，享受家庭與公共領域之內的雙重角色，勇於犧牲。雖然在抗戰爆發之後，她認識到國家可能只是民族振興的工具，不過卻堅信在當今的世界潮流之下，民族唯有附著於國家才能存在。蔣夫人的宗教觀重新詮釋了新生活運動，使基督教文明成為中國國家的重要內涵。雖然在個別事件上，她可能影響到蔣介石，但大的文明格局已冥冥註定，她的影響力只能藉助於西方的國家與宗教觀，故對於男性為中心的父

權文化，反而有更深刻地鞏固作用。

蔣夫人的政治思想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其是否具有創意，而在於她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將西洋的國家觀引介到中國，這一方面使中國的民族振興與文化傳統疏離，從而淪為後進國家；另一方面也因為西洋國家觀的父權中心傾向，而鞏固了新中國的父權特色；最後，更因為她身為女性，容許了西方將中國的主權，繼續凝固在女性印象中。